

歷史

弗朗哥·諾戈拉1964年為 葡萄牙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 所作的無果而終的努力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

葡萄牙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 (Franco Nogueira) 1964年一月至二月建議進行的建立葡萄牙與中國大陸外交關係的行動，使葡萄牙政權分裂成對立的兩個陣營。跟以往一樣，部長會議主席薩拉查拒絕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提議，而澳門葡萄牙政府、葡萄牙海外駐軍司令部及海外部和外交部都傾向於承認北京政權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薩拉查的拒絕基於純粹意識形態的原則，即基於其對共產主義的根深蒂固的厭惡 (Fernandes, 1999, p. 990)。對葡萄牙的其他政權機構而言，與北京建交是順利管治澳門、有效減少澳門支持毛澤東政權的傑出華人在澳葡政府中的權力和影響並削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貿易、經濟、金融和結社領域對澳門的實際控制和影響的不可或缺的條件 (Fernandes, 1999, p. 991-993)。

諾戈拉試圖說服薩拉查放棄不妥協立場，為此展開了一場旨在說服政府首腦承認毛澤東政權的秘密行動。然而該行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其主要原因有兩個。首要原因是薩拉查的獨斷；其次是薩拉查專制政權的性質使然。

對政治領導人的個人特點或特質在對外政策領域的影響所作的一些研究，都強調了嚴厲和堅定的思想對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重要性。為了獨斷專行，獨裁領導人一般都遵循傳統和現行的準則和原則。因此，一個

* 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政治領袖“越是獨斷專行”，“其政府就越難以改變其對既定政策的立場”（Hermann, 1976, p. 66）。如果我們考慮到“朋友的意識形態條件的選擇及對手的確定”，那麼這種思想就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Smith, 1989, p. 195）。

該變數因葡國體制的性質而得到了特別的強化。薩拉查政體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權力的逐步集中和事實上的無限制”（Cruz, 1988, p. 255）。這種情況的演變得以將薩拉查主義變成“一種獨裁”（同上引述）。

葡國政體的這兩個特點使得諾戈拉的努力僅僅局限於政權內部的秘密行動，局限於外國外交使團在葡國政府的活動以及當時的外國和葡國報刊對此事所作的報道。

我們希望通過本文對與弗朗哥·諾戈拉的努力相關的利益、薩拉查立場的演變、北京政權對澳門現狀的再確認及這種努力從中方利益角度來看所具有的政治可行性作一個粗淺的分析。結尾部份是我們的結論。

與弗朗哥·諾戈拉的努力相關的利益

弗朗哥·諾戈拉承認中國大陸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利益源自不同的因素，有個人的，也有高層政治的。弗朗哥·諾戈拉擁有東方的廣泛經歷。他於1946年2月15日至1949年9月14期間擔任“駐日聯軍高級司令部葡國政府代表”（外交部，1964a, p. 23）。東方使之心醉神迷，以至於他呈交給外交部的14份報告中有8份涉及東方，佔總數的57%。

國際體系中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政局演變及其對葡國立場的影響，對弗朗哥·諾戈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以至於他向外交部1952年的一次內部競選就此題目提交了一份簡明的專著。在這份專著中他分析了1945年後“東方世界的覺醒”以及可能影響本地區政治的重大問題。他還在這方面對那些可能影響地區大強國（中國、日本和印度）和小強國（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菲律賓、印度支那、馬來西亞和韓國）對內對外政策的因素及俄國和美國在本地區施加的外部影響作了界定，此外他還對該地區未來政治舞台的演變作了分析。

本文的主導思想是，“世界政治的軸心”已經從大西洋轉移到了太平洋，而且東西方間的政治和文明衝擊勢在必行，因為“東方的覺醒逐步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平衡”（1952, p. 108）。談到中國大陸，弗朗哥·諾戈拉用贊揚的口吻辯解道：“毛澤東試圖跟上西方的進步以使中國重新走向成為東方第一強國的道路。北京曾經是一個文化和文明的舞台，曾經是衰敗但保留了最強大東西的世界中心。古老的城市重新成為首都：這種事實本身就是追求的一種象徵，是確認對中國的最本質最具活力事物的追求”（出處同上p. 32）。該著述曾以“為東方而奮鬥”為書名出版，共出了兩版。¹

從另一方面來看，弗朗哥·諾戈拉與Vera Wang成了婚，其妻子是“蹲了幾年監獄的”一名中國反共外交官的女兒（Antunes, 1996, p. 175）。這種背景無疑影響了弗朗哥·諾戈拉後來在中國大陸問題上的行為，如果我們考慮到弗朗哥·諾戈拉與Vera Wang 1947年的婚事“被許多人視作為對權力的挑戰，這在當時是地道的不軌行為，並可能使弗朗哥·諾戈拉在外交生涯中受到孤立”（Neves, 1999, p. 201）。

就這樣，在就任葡萄牙外交部長短短五個月後的1961年10月，弗朗哥·諾戈拉²就指示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阿梅達（Fortunato de Almeida）“對1948年至1958年有關中國的卷宗作細緻的查找”。儘管作了大量的查找，但沒有找到“部長先生需要的那種類型的任何指示”。³

果阿的陷落為弗朗哥·諾戈拉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使之得以再次就葡國對中國大陸和澳門的態度發表看法。在1962年1月13日提交給薩拉查的那份冗長的政治報告中，葡國外交部長主張對葡國的對外政策和殖民地政策進行重新引導，以紓緩葡萄牙在國際上的孤立。實際上，這份文件承認反殖民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而不是軍事上打垮政府，而且認為“葡萄牙不”擁有“獨立推行其政策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為了避免政體的崩潰，就要保持解決葡屬殖民地問題的政治談判途徑，放棄“單一的作法，為每一個海外領地尋求不同的解決方案”。因此，他辯解說，並

1. 第一版由海外調查委員會於1957年出版，第二版由Atica於1962年出版。

2. 1961年4月莫尼斯（Botelho Moniz）將軍策劃了一場失敗的政變，政變導致外交部改組，1961年5月4日弗朗哥·諾戈拉就任外交部長一職。

3. 外交部，“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阿梅達（Fortunato de Almeida）1961年10月10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批示”，PEA M.263, AHDMNE，里斯本。

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具有相同的政治價值，認為可以用“主要立場和非主要立場”加以區別。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佛得角屬於第一種類型，而其他的殖民地則納入“非主要立場”類別。

至於澳門，他建議與北京舉行談判，讓中國同意與葡萄牙建立外交關係，以便將“澳門變成一個自由港，一個地位有待確定的共管地，或在保持與葡萄牙象徵性關係的情況下移交主權”（Fernandes, 2001, p. 101 – 103）。然而薩拉查拒絕了這份文件。政府首腦1962年2月20日接見弗朗哥·諾戈拉時表示：“毫無疑問我們面臨轉折，但我還是原來的想法”（Nogueira, 1987, p. 24）。

儘管在遭到政府首腦的拒絕，弗朗哥·諾戈拉的行事方針還是試圖安撫葡萄牙名義管治下小飛地的北京政府的利益。如，葡國外交部長就曾向1962年至1966年任澳門總督的羅必信建議在澳門的管理上給予“活躍的華人力量”“一個突出的地位”，但遭到後者的反對（Lopes dos Santos, 1994, p. 363）。另一方面，弗朗哥·諾戈拉支持澳葡政府逐漸接近北京並逐步斷絕與台北關係的政策，其結果是於1963年9月18日禁止了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活動（Fernandes, 2000b, pp. 197及642 – 643）。弗朗哥·諾戈拉對其指導方針作了解釋：

“我們瞭解到試圖利用澳門省進行不符合當地法律也不符合我們需要保持、正在保持並希望保持的與中國大陸的友好睦鄰關係的活動”。⁴

根據該指導方針，葡萄牙外交部長對澳葡政府鎮壓搗毀台灣政府設在澳門針對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的諜報、反諜報和秘密活動網絡表示贊同。這種指導方針顯然得到與中國大陸站在一邊的澳門傑出華人的贊同，此外他還對設在澳門的中國“高級專員公署”和“影子政府”（南光貿易公司）表示同意。

通過這種單邊行動，弗朗哥·諾戈拉還試圖表明薩拉查政府對蔣介石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及聯合國其他專門機構內支持亞非集團提出的有關葡屬殖民地的提案的不滿和報復。尤其針對的是安理會成員台灣投票支持1963年7月31日譴責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的決議案⁵，以及1963年7月4

4. “弗朗哥·諾戈拉聲明”，消息日報，第99年度，第35053期（1963年10月1日），第8頁。

5. 同上。

日台灣在表決亞非集團提出的決議案時投棄權票，而該決議案導致葡萄牙被逐出教科文組織的公開教育大會。⁶

增加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具有某種前景。這種思路被里斯本的貿易報披露了出來。這份報紙在一篇冗長的社論中辯解說，要達到的目的應該是如下：葡萄牙傳統商品（軟木、樹脂、葡萄酒、藥物、沙丁魚罐頭等）和製成品（冶金產品和電器等）的貿易，以及澳門的政治貿易結合點功能，在雙邊層面上“里斯本扮演東方產品在歐洲集散中心的角色”。⁷

弗朗哥·諾戈拉身邊最親近的合作者普遍相信，承認北京可能是葡萄牙政府的“政治現實主義”的一份明證。由於葡萄牙在澳門實施的管治在很深程度受制於北京政府的政治、經濟、金融、貿易和結社利益（Fernandes, 2000a, pp. 56 – 57），這樣，沒有甚麼能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切合該飛地的具體現實。

這種潛在的新指導方針另一方面旨在保障澳門的安全並滿足這塊飛地的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駐軍司令部自1949年以來反覆提出的要求（Fernandes, 2000b, pp. 191及206）。

儘管弗朗哥·諾戈拉以各種方式和藉口表明了所有這些因素，但在葡萄牙外交圈內還是有不同的聲音。譬如，在毛澤東1949年奪取政權之前任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後任葡萄牙駐海牙大使的豐塞卡（J. B. Ferreira da Fonseca）在1964年1月29日寄給弗朗哥·諾戈拉的冗長的公文中稱：“至於澳門，不相信承認共產黨中國就會給澳門帶來最大的保障以面對任何入侵。中國將在她願意的時候奪取澳門，無論是否承認她”。他還寫道，如果“承認……與英國同時進行，那麼可以理解成葡萄牙願意通過承認來表明她不敵視毛澤東，但一切都將和原來一樣，不會有源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具連續性的解決方案”。⁸

6. “在日內瓦的公開教育大會上，儘管通過了將葡萄牙排除在會議之外的非洲國家動議，但葡萄牙代表團並沒有放棄工作”，消息日報，第99年度，第34965期（1963年7月5日），第1–5頁。

7. “市場更新”，里斯本貿易報，第111年度，第33641期（1964年2月11日），第1頁。

8. 外交部，“葡萄牙駐海牙大使豐塞卡（J. B. Ferreira da Fonseca）1964年1月27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公文”，封面標題為“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葡萄牙承認共產黨中國，1964 / 65年”，第2卷，PEA M.263, AHDMNE，里斯本。

策略

弗朗哥·諾戈拉清楚瞭解薩拉查政治和歷史上在中國大陸問題上的不妥協態度，因此當他訪問馬德里時採取了散佈流言的作法。葡萄牙外交首腦試圖通過這樣的秘密活動營造出有利於其利用國際和葡萄牙報刊達到目的的内部政治時機。為了保障得到薩拉查的支持，他還任用了加爾定，這是一名實施敏感政治行動的政府秘密特務。最後，為了就近控制事態發展及避免泄露情報和疏失，葡萄牙外交部長不僅籌劃而且還對葡萄牙駐外外交官封鎖消息，使他們祇能靠自己的想像和創造力行事。

當政府內部的不同派別就承認及與中國大陸建交問題展開辯論時，弗朗哥·諾戈拉在國際傳媒上就提及的葡萄牙新指導方針散佈了流言。1964年1月13日至23日訪問馬德里時，葡萄牙外交首腦給紐約時報記者霍夫曼（Paul Hofmann）“留下了一句關於承認人民中國的潛在意圖的秘密但用於發表的話”（1987, p. 88）。

弗朗哥·諾戈拉披露的內容發表在1964年1月17日的紐約時報上。根據霍夫曼的說法，葡萄牙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當然這裡指的是弗朗哥·諾戈拉，向他表示里斯本當時正在考慮與北京建交，而且對此表示相當的樂觀。關於北京與葡語非洲解放運動之間的關係，弗朗哥·諾戈拉並不看重中國大陸向以羅伯特為首的安哥拉全國解放陣線提供的援助，⁹而且並不擔憂中國總理周恩來對非洲大陸訪問。¹⁰

為了突出里斯本與北京之間的良好諒解氣氛，弗朗哥·諾戈拉透露說，北京政府曾經要求派一名葡萄牙記者到中國，而葡萄牙政府則可能批准此事。在被反覆問及其主動行動會對葡國與台灣的關係產生甚麼影響時，弗朗哥·諾戈拉回答說，承認中國大陸並不一定要斷絕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為此他引用了塞內加爾的例子，塞內加爾在承認北京政府的同時保

9. 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長陳毅元帥與羅伯特利用肯尼亞獨立慶典的機會於1963年12月12日在內羅畢舉行了一次會晤。在會晤中，著名的中國領導人承諾在政治和軍事上向安哥拉全國解放陣線提供幫助（Fernandes, 2000b, p. 202）。

10. 中國總理周恩來1963年12月12日至1964年2月4日訪問非洲諸國，這是中國對非洲的首次大型政治訪問活動，通過是次訪問加強了向葡語非洲國家的解放運動提供政治、外交、道義和軍事技術方面的援助（Hutchinson, 1975, pp. 61-71；及Fernandes, 2001, pp. 75-77）。

持了與台北的關係。¹¹ 儘管突尼斯承認了毛澤東的政府，但仍在表面上保持與台灣的关系（Hutchison, 1975, p. 149）。這種回答的主要目的是紓緩政府內部認同蔣介石反共立場的右翼可能產生的敵意反應。

內塞西達宮通過駐紐約法國報刊記者埃德加·思諾（Edgar Snow），一名非常接近北京政府領導層的美國記者，向周恩來詢問里斯本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時機。中國政府首腦機敏地回答說，北京有意與“所有的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Nogueira, 1984, p. 552）。與此同時，親中國大陸政府的澳門傑出華人中的一名著名領袖，推測其人是何賢，前往北京探聽葡萄牙承認毛澤東政府的可能性，他一回到澳門，就知會澳門總督羅必信，稱“中方樂意接待葡萄牙政府的使者以探討和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出處同上）。

為了說服薩拉查批准其行動，弗朗哥·諾戈拉任用了政府的“秘密特務”加爾定（Antunes, 1996, p. 175）。加爾定之所以被任用是因為他在完成國家機構無法實施或體制上不具備條件的敏感使命方面具備經驗（出處同上，p. 174）。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是薩拉查信任的人，屬於葡萄牙極右翼。

這樣，加爾定2月5日抵達里斯本後就會見了弗朗哥·諾戈拉。弗朗哥·諾戈拉在會見中向其解釋了其行動的目標。就此，加爾定寫道：

“……他告訴我說，是試圖與人民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事。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使命非常敏感，不能失敗，而且把全部押在這上面了。部長會議主席[薩拉查]有保留，但還是同意了，而且還批准了對我的任命[……]。弗朗哥·諾戈拉對我解釋說，這種接近應該是地道純粹的，一旦啟動就要有最終結果，即建立非官方關係並在短期內過渡到外交關係。人民中國可能對此有政治意願，因為它意味著一個像葡萄牙這樣的傳統上反共的大西洋聯盟成員國擺脫了美國的控制。法國承認了人民中國（法國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受到猛烈的批評，祇有德國和葡萄牙持贊同的立場），這意味著北京獲得了矚目的勝利，而我們則可以從中獲取補償。然而需要抓緊行動，不要落在其他西方國家的後面，它們亦會走同樣的道路。結論是：行動一旦開始就不可逆轉，必須有把握地認真進行”（Jardim, 1976, pp. 63–64）。

11. Paul Hofmann, “Lisbon Is Reported to Consider Ties With Chinese Reds”, *New York Times* (1964年1月17日)，第4頁。

此次政治外交行動非常重要，弗朗哥·諾戈拉的秘密努力極其秘密，沒有以任何方式與葡萄牙駐外使節協調。相反，對他們封鎖了有關此次努力的信息。這使得一些使節認定他們對此次努力並不知情，或在某種程度上求助於自己的想像和創造力以便能夠應付外國同行提出的問題。

如，當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Eduardo Condé）被其巴西同行馬加良斯（Francisco de Borges Magalhães）問及葡萄牙承認北京政府一事時，葡萄牙領事“向他說了實話：無論是官方的還是私下的，我對此事都一無所知”。¹² 而葡萄牙常駐紐約聯合國使團代理代表巴特利西奧（António Patrício）則不得不運用些許創造力，以便能夠回答其他國家的同行就此事提出的問題。巴特利西奧稱，當提及此事時，他力圖“沿用，尤其當涉及美國人時，以下應對方法：儘管對我們近期要承認中國大陸的傳言沒有任何肯定的說法，我認為，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也沒有任何理由值得我們大驚失措，因為我們也是一個亞洲國家，而該大陸的所有或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已經承認了北京政府，我們目前是惟一與該國接壤但尚未與之建交的國家。非洲是這種傾向，而歐洲現在也在走相同的道路，因此，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肯定不能是最後一個與北京建交的國家”。¹³ 而葡萄牙駐北大西洋理事會代表團團長庫尼亞（Vasco Pereira da Cunha）大使也祇是通過國際傳媒才得以瞭解此事。為了準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的各種會晤和會議，他要求“在可能的情況下瞭解我們在承認北京政府一事上的立場”。¹⁴ 沒有向葡萄牙駐外使節透露信息，主要目的是為了能夠就近掌握事態，避免“泄露消息”，當然，外交部長及其辦公室特意披露的消息除外。

促使薩拉查最初表示同意的一些因素

是甚麼原因促使薩拉查最初在“有保留的”的情況下對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表示同意呢？政府首腦起初傾向於弗朗哥·諾戈拉的主動行動，是

12. 外交部，“自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Eduardo Condé）處收到的1964年1月27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174 / 64號公文，第2頁”，PEAM.263, AHDMNE, 里斯本。

13. 外交部，“自葡萄牙常駐紐約聯合國使團代理代表巴特利西奧（António Patrício）處收到的1964年1月24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1 - A號航空郵件，第1頁”，PEAM.263, AHDMNE, 里斯本。

14. 外交部，“葡萄牙駐北大西洋理事會代表團團長庫尼亞（Vasco Pereira Cunha）大使1964年1月29日發給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16號電報”，PEAM.263, AHDMNE, 里斯本。

因為中國大陸顯示出了試圖接近里斯本的強烈的政治跡象。這樣，北京1949年以來在澳門、香港和台灣問題上出於生存和鞏固政權的實用主義考慮而犧牲了其反帝反殖的意識形態原則，此外，六十年代初，毛澤東試圖獲得薩拉查的支持以組織一個希望確立其國家獨立或自治與美國的霸權企圖抗衡的中小西方強國陣線。為了粉碎華盛頓施加的封鎖，毛澤東政府為國際體系設計了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主要目的是抗衡美國的霸權主義。“第一中間地帶”顯然是由第三世界國家組成的。

“第二中間地帶”包括那些企望確立其面對美國的獨立和自治的西方中小強國。這種劃分的理論思想明確地反映在1963年1月2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 (Yahuda, 1983, pp. 34–35)。

該理論與一些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非常不滿的西方政治領導人對華盛頓懷有的巨大敵意吻合。譬如法國總統戴高樂對“雅爾塔綜合體”不滿，他致力於與其他挑戰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領袖和霸權地位的強國建立關係 (Hnton, 1970, p. 124)。

而薩拉查政府當時因為缺少美國對葡萄牙殖民政策的支持而受到極大的削弱。根據政府主要領導人的看法，在果阿危機時¹⁵，美國沒有支持也沒有在政治上聲援葡萄牙，美國在1963年7月31日譴責葡萄牙在非洲殖民政策的聯合國安理會第S / 5380號決議的投票中投了棄權票，¹⁶而且對葡萄牙的“海外問題”的解決採取了中間政策 (Amaral, 1994, pp. 57–58)。

然而，中國推動“第二中間地帶”理論的企圖，在美、蘇、英1963年8月5日正式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前一天獲得了新的動力。為了削弱新的國際體系，周恩來總理於1963年8月2日就該問題向部長會議主席安東尼奧·薩拉查發了一份正式照會。¹⁷中國總理建議召開一次政府首腦國際會議以

15. 薩拉查及其死心塌地的擁護者在1962年1月3–4日全國議會上就“印度入侵佔領果阿”發表的講話，這些講話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反美態度。參閱議會日報，1962年1月4–5日第9及第10期。

16. “聯合國仍然缺乏理智、公正和公義：安理會通過了經委內瑞拉修改的亞非國家提案，法國、英國和美國投了棄權票”，消息日報，第99年度，第34992期（1963年8月1日），第1–2頁。

17. 外交部，“中國總理周恩來1963年8月2日致部長會議主席安東尼奧·薩拉查的正式照會”，封面標題為“與人民中國的政治關係，1964年”。PEA – Confidenciais M. 20, AHDMNE, 里斯本。這份文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薩拉查政府自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

廢除三方協議。由於中國大陸尚未擁有核武器，因此試圖利用政府首腦國際會議以削弱反核擴散國際體系，並進而能夠加速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儘管薩拉查選擇了不答覆周恩來，但這份信件可能促使他初步批准了弗朗哥·諾戈拉實施其規劃的行動，儘管“有保留”。政府首腦於1963年8月10日將周恩來的照會轉給了弗朗哥·諾戈拉。



里斯本

葡萄牙共和国总理安东尼奥·萨拉查博士

閣下：

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建议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

（一）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具体地说，就是：不使用核武器，不输出核武器，不输入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试验核武器，不储存核武器，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统统销毁，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研究、试验、生产核武器的机构统统解散。

（二）为逐步履行上述义务，首先采取下列措施：

甲、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在内；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乙、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中欧无核武器区，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

— 1 —

1日成立以來從來不承認也沒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正式外交關係。另一方面，這是中國高層領導人第一次試圖與薩拉查直接接觸。在此之前，周恩來僅向葡萄牙駐中國公使發了兩份外交照會。1947年2月1日的第一份照會告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一份決議，宣告廢除國民黨政府與外國列強簽訂的所有條約和協議（Fernandes, 2000b, p. 45）。第二份照會告知毛澤東於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稱中國新政府準備與其他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Fernandes, 2000b, pp. 71及549-551）。

丙、不以任何形式輸出和輸入核武器和製造核武器的技術資料。

丁、停止一切核試驗，包括地下核試驗在內。

（三）召開世界所有國家的政府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以及為逐步實現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而採取上述四項措施的問題。”

鑒於世界人民要求免除核戰爭的威脅、要求維護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迫切願望，中國政府誠懇地希望，這個建議能夠得到貴國政府的有利考慮和積極響應。

順致崇高的敬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1963年8月2日於北京

— 2 —

促使薩拉查批准弗朗哥·諾戈拉行動的第二個原因似乎是1964年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提出的就葡語非洲問題在北京和里斯本之間簽署一份策略協議的建議。根據何賢的建議，他是親中國大陸的澳門傑出華人的領袖、飛地的立法會成員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特邀委員”，“葡萄牙從非洲撤退但繼續留在非洲……在共產黨中國的幫助下”（Lopes dos Santos, 1994, p. 359）。如果何賢的建議付諸實施，那麼，葡語非洲獨立運動外部援助的主要來源之一可能就會落空甚至消失殆盡，並可能有助於紓緩亞非集團對葡萄牙施加的壓力。換言之，薩拉查政府將欣慰地在低強度層面減少葡屬非洲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活動。考慮到解放運動佔據的土地仍然相當有限以及其生存主要依賴從外部獲取的援助，這項建議可能會導致葡語國家獨立運動遭受重大的政治挫折，另一方面，對葡語非洲的潛在諒解，可能會減

輕亞非集團對薩拉查政府施加的政治外交壓力。¹⁸ 北京可能利用其在該集團內的威望以紓緩其針對薩拉查政府及其殖民政策的敵對立場。¹⁹

這兩種情況都會對薩拉查政府產生正面的影響。首先，可能有助於紓緩葡萄牙在政治外交領域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國際孤立狀態。²⁰ 其次，使薩拉查得以處理如加爾萬（Henrique Galvão）和德爾加多（Humberto Delgado）等人這樣的問題，這兩人使政府在國際上的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

再者，薩拉查仍然對印度入侵果阿深感痛心。他知道中國在邊境衝突中打了勝戰，是自願在1959年和1962年將其軍隊撤出了印度領土（Whiting, 1975, pp. 1及10-12; Roy, 1998, p. 25），里斯本因此認為與戰勝其敵人的人結盟是上策，目的是偶爾進行明確或隱蔽的合作以削弱新德里政府。

外國駐里斯本外交使團的反應

紐約報紙發表的消息傳遍了整個世界。通訊社和國際傳媒對此作了大量的報道。如，美國的全國廣播公司廣播網於1964年1月24日稱，墨西哥、比利時和葡萄牙將跟隨法國承認北京政府。²¹

一些歐洲領導人的反應亦對弗朗哥·諾戈拉策劃的行動有利。比利時外交部長斯帕克（Paul-Henri Spaak）²² 在接受該國國家電台採訪時認為，葡萄牙承認北京甚至可以用里斯本因“澳門原因”而對中國大陸擁有的“特殊利益來解釋”。²³

18. 1963年非洲統一組織高峰會議後，一些保守的非洲國家政府斷絕了與葡萄牙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如埃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喀邁隆、埃塞俄比亞、馬達加斯加、突尼斯、科納科里幾內亞、塞內加爾等國。

19. 有關葡萄牙因其殖民政策而在國際上日益孤立的情況請參閱Pinto的著述，1999年，第52-58頁，及Léonard的著述，1999年，第444-6頁。

20. 1961年安哥拉發生武裝鬥爭後，薩拉查政府的殖民政策在雙邊和多邊層面都備受譴責。譬如，一些政府開始減少與里斯本的外交關係，一些政府甚至召回了駐里斯本外交使節，或將大使或公使召到首都磋商，這兩種方式都是為了表達他們不贊同葡萄牙政府的行為。

21. 外交部，“葡萄牙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羅查（Meneses Rosa）公使1964年1月24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31號電報”，PEAM. 263, AHDMNE, 里斯本。

22. 斯帕克（Paul-Henri Spaak）1947年3月20日至1949年8月11日期間任比利時總理兼外交部長，1957年至1961年間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六十年代任比利時外交部長。

23. 外交部，“葡萄牙駐布魯塞爾大使雷唐（Eduardo Borges Vieira Leitão）1964年1月27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第12號電報”，PEAM.263, AHDMNE, 里斯本。

國際傳媒對葡萄牙可能承認北京政府一事作了大量的報道，這使一些駐里斯本的外交使團對葡萄牙政府作出了反應。中華民國駐里斯本大使王華正（譯音）²⁴1964年1月20日要求正式會見外交部秘書長阿爾切（José Luís Archer）商討此事。台灣使節力圖瞭解紐約時報報道的有關葡萄牙承認北京政府的消息的真實性。阿爾切則努力“給他留下他正在研究此事的盡可能肯定的印象”。²⁵

與此同時，為了給弗朗哥·諾戈拉行動的政治熱情潑冷水並勸說葡萄牙媒體支持蔣介石政府，台灣政府新聞辦公室於1964年1月23日在台灣出版了一份非常有利於國民黨政府的47頁葡文宣傳材料，並在里斯本散發。²⁶這份題為“今日自由中國”的小冊子由消息日報的國外部主任國際評論員卡布拉爾（Morais Cabral）撰寫，而且，為了抬高台灣政府，這份宣傳材料還記述了與台灣外交部長沈昌煥的會晤。這位著名的政治家“以敬佩的口氣提到薩拉查，強調了他多年來領導葡萄牙政府”（Cabral, 1964?, p. 40）。

返回里斯本的當天，即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應美國駐里斯本大使安德森海軍上將（George W. Anderson）的要求會見了他。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以及葡萄牙可能承認北京政府，是會見中討論的話題。美國大使告訴葡萄牙外交部長，說美國政府支持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有關非洲自決問題的立場。同時他呼籲葡萄牙政府以相同的方式行事以削弱非洲在葡屬殖民地和南部非洲問題上形成的團結。美國大使認為，葡萄牙可以發表一份總體聲明，表明她支持自決。美國政府亦準備發表一份公開聲明支持葡萄牙對此事的立場，並公開表明反對對葡屬非洲殖民地發動任何進攻。為了說服葡萄牙政府作出讓步，美國大使告訴弗朗哥·諾戈拉，如果葡屬殖民地的前途仍然懸而未決，外國對葡萄牙的投資將會減少。

24. 這是駐葡國外交使團中資歷最長的使團團長。他自1947年8月30日就派駐葡國。此外，他還是通過換文於1947年4月1日在中國外交部簽署的關於治外法權和相關事務的中葡條約的中方談判代表之一。葡萄牙政府始終沒有改變這位外交官的“特命全權公使”的地位，甚至在維也納外交公約1964年4月24日多邊簽署及1968年10月11日在葡萄牙生效後都是如此（外交部，1973年，第1頁）。

25. 外交部，“外交部秘書長阿切爾（José Luís Archer）與中國駐里斯本公使王華正1964年1月20日的談話記錄”，PEA M. 263, AHDMNE, 里斯本。

26. “卡布拉爾（Morais Cabral）報道的今日自由中國”，消息日報，第100年度，第35163期（1964年1月23日），第2頁。

此次會見的第二個主要話題是“葡萄牙將按照法國的作法承認北京政府的傳言”。美國大使列舉了三條基本理由對法國承認毛澤東政權表示反對。第一，北京入侵朝鮮；第二，千百萬美國人為對抗中國入侵戰死在戰場；第三，“現在承認北京的中國，在政治上是草率的，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²⁷ 傳遞的信息簡單明確：葡萄牙政府不應該步戴高樂政府之後塵。為了強調其立場，安德森大使提醒弗朗哥·諾戈拉說，美國的“葡萄牙朋友”——尤其是軍事手段和公眾輿論——，“所有的人都將處於窘境，這樣他們還怎麼繼續為我們而戰呢？”²⁸

弗朗哥·諾戈拉的回答有點咄咄逼人。儘管他承認美國軍人在朝鮮為捍衛不侵犯原則而戰，但他辯解說，他們同樣也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而戰。根據葡萄牙外長的說法，承認北京並不會影響這些原則也不會影響美國的利益。當然，會傷害美國人的感情。然而，葡萄牙可以做的並不多，葡萄牙人的感情亦因在果阿問題沒有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的支持而受到傷害。儘管印度入侵並佔領了果阿，但弗朗哥·諾戈拉提醒安德森大使說，美國政府在果阿陷落48小時後發表了一份公告，重申美印關係及美國援印計劃不會受到影響，而且說肯尼迪總統將在15天後訪問新德里與尼赫魯會晤。而安德森大使並沒有對這樣的說法提出質疑。

弗朗哥·諾戈拉繼續闡述，稱他並不瞭解法國之所以承認北京的原因。然而葡萄牙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去這麼做。薩拉查的繼承人認為：“澳門、貿易、人員流動、財產等——這一切都是促使我們承認中國大陸的原因”。²⁹ 他承認與北京建立關係“可能會使我們在美國的朋友感到難堪”，但他仍然認為他們不是非常“雄辯”，說他們應該努力強調美國政府實行的與葡萄牙對立的政策，而不是批評薩拉查政府。³⁰

弗朗哥·諾戈拉推行的方針隨著1964年1月27日巴黎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消息的發表而得到加強。³¹ 當時的國際氣候對承認北京非常有利。

27. 國立檔案學院 / 東坡塔，“關於弗朗哥·諾戈拉部長與美國大使安德森1964年1月24日談話的外交部秘密記錄”，AOS/CO/NE-30B, Pt.36, fl. 207, IAN/TT, 里斯本。

28. 同上。

29. 同上，第210頁。

30. 同上，第211頁。

31. “轟動消息：巴黎承認北京”，消息日報，第100年度，第35168期（1964年1月28日），第1頁。

法國承認北京四天後，奧地利駐里斯本大使恩德爾（Rudolf Ender）要求會見葡萄牙外交部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以談論此事。內塞西達宮第三號人物弗拉古蘇（José Manuel Fragoso）祇是對奧地利駐里斯本使團團長說，“不能預計”葡萄牙外交部“會做出某種矚目的姿態”³²。

同日，法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參贊梅列（Maurice Merllié）會見了葡萄牙外交部海外政治談判處處長奧利維拉（Soares de Oliveira），對比利時外長斯帕克就葡萄牙可能承認北京政府一事發表的聲明以及中國總理周恩來訪問非洲所造成的影響等事項交換了看法。關於葡萄牙可能承認毛澤東政府一事，奧利維拉告訴法國參贊說，“就我的理解而言，這些消息很自然地納入可能發展的範疇，而且它們體現的某種利益是以一種有邏輯基礎的思想為核心的”。³³

另一方面，1964年1月31日在內塞西達宮會見日本駐里斯本大使吉田（Kenkichi Yoshida）時，葡萄牙外長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場。然而，當日本大使認為戴高樂對北京的態度分化了西方的團結時（這也是葡萄牙極右翼的一些派別及美國的說法），弗朗哥·諾戈拉當即予以反駁：“不團結早已經存在，法國的態度更多的是結果而不是原因”。³⁴

甚至葡萄牙駐里約熱內盧大使亦認為葡萄牙和中國很快就會建立關係。回到里約熱內盧後的1964年1月31日，拉莫斯（João de Deus Battaglia Ramos）接受了巴西媒體的採訪，他當時聲稱：

“葡萄牙冷靜並高度評價法國承認中國，並致力於看到共產黨中國返回聯合國一事得到順利解決。葡萄牙當局對此事進行仔細研究，目的是使位於中國領土內的澳門省的局勢變得和諧”。³⁵

32. 外交部，“葡萄牙外交部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弗拉古蘇（José Manuel Fragoso）大使1964年1月29日與奧地利駐里斯本大使魯道夫·恩德爾的談話記錄”，PEAM. 263, AHDMNE, 里斯本。

33. 外交部，“外交部海外政治談判處處長奧利維拉1964年1月29日與法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參贊梅列談話記錄，第1頁”，PEAM. 263, AHDMNE, 里斯本。

34. 國立檔案學院 / 東坡塔，“外交部關於弗朗哥·諾戈拉部長1964年1月31日與日本大使吉田的談話記錄”，AOS/CO/NE-30B, Pt.37, fl. 214, IAN/TT, 里斯本。

35. “葡萄牙也希望共產黨中國加入聯合國”，天天報 [里約熱內盧]，（1964年2月1日），第1-7頁。

政治外交時機的演變為弗朗哥·諾戈拉提供足夠的活動餘地，使之得以在1964年2月4日在內塞西達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以某種可靠和樂觀的態度去回答一名記者的提問：

“顯然我瞭解關於葡萄牙政府要承認北京政府的那些傳言。這並不是新的傳言；時不時就會出現類似的消息。可以理解的是，這些消息可以真正出現而且得到傳播。我們大家都記得澳門的存在，都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葡萄牙當局和毗鄰的中國當局之間事實上存在的完全正確的關係。另一方面，還有邊境雙向層面人員的實質性流動；而且還有資本的流動。最近，相同性質的新傳言又出現在國內和國際的報刊上；甚至國內和國際的新聞機構還就此發表了評論和建議。西方的一個大國（法國）也是葡萄牙的友邦和盟國就此事作出的眾所周知的決定，或許推動了上述情況的出現。顯然，我們不能不說，也不能不指出的是，而且我們要說的甚至也是普遍的意見，即中國大陸是個強大的現實，或遲或早，在時機合適的時候，她都不能不被納入國際社會的生活之中。但是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嚴肅的行動，可以想像得出，它的涉及面是很多很深的，在實施這項行動之前，所有這些眾多深刻的涉及面都必須認真地加以斟酌”（外交部，1964年，第1頁）。³⁶

總而言之，駐葡萄牙外交使團的反應總體上對承認北京不太有利。然而，一些重要的盟國，如德國、西班牙、英國和巴西等，並沒有對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作出反應。

葡萄牙傳媒的分裂

當時的葡萄牙報刊分成兩個陣營。一般來說，政府的官方和半官方報刊（晨報和心聲報）暗地裡反對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主張“兩個中國”的政策，而“表面上獨立的”（人民日報和貿易報）和“溫和反對派”³⁷的新聞機構（里斯本日報和共和國報）則對弗朗哥·諾戈拉主導的行動表示贊同。

36. “部長會議主席將寫信對赫魯曉夫寫給他的一封信作出答覆——外交部長昨天對記者披露道”，心聲報，第38年度，第13176期（1964年2月5日），第6頁。

37. 有關葡萄牙主要傳媒政治站隊的分析，可參閱José Tengarrinha的著述，1999，第246頁。

與國際傳媒相反，葡萄牙報刊祇是在弗朗哥·諾戈拉的“試探氣球”在紐約的報紙上公開四天之後才作出反應。新聞檢查允許就此事發表社論和文章，這表明某些官方圈子有意推動對此事的討論。

里斯本日報社長洛佩斯 (Noberto Lopes) 於1964年1月21日發表了一篇社論，對紐約時報文章主張的方針表示支持。撰稿人辯解道，“考慮到兩個政府奉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澳門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如果不能說是親密的話，起碼也不能說是不友好的”。他提醒說，澳門與毛澤東政府及蔣介石政府都有可觀的貿易往來，而且國民黨組織和中國共產黨人在澳門共處。他還補充說，法國不久前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將推動葡萄牙承認北京。他指出，國際傳媒高度關注此事。在這方面，洛佩斯認為：“實際上葡萄牙和北京政府之間不存在對立的利益。完全可以在保持我們在中華民國的外交代表團的前提下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³⁸ 他解釋說，美國對葡萄牙殖民地問題堅持持公開敵意的態度，“也迫使我們實施一項有悖於我們利益的政策，如果我們承認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包含著任何好處的話”。³⁹ 眾所周知，這份晨報的看法並不總是與政府的看法合拍。

第二天，共和國報這份晚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對法國政府承認北京政府表示完全支持。這份民主反對派的報紙認為，華盛頓和巴黎在承認問題上的分歧是明顯的，然而法國順應“歷史潮流”，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是最令人垂涎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⁴⁰

1964年1月24日，極端保守的天主教日報心聲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主張在“兩個中國”的前提下承認北京政府。由社長兼出版商馬爾克斯 (Pedro Correia Marques) 撰寫的社論主張承認“兩個中國”，這是被北京、台北和華盛頓斷然拒絕的立場。此外，整篇社論都是針對肯尼迪政府對葡萄牙的殖民地政策所持的敵對立場。撰稿人不無詼諧地問道：“葡萄牙要是這麼做了 [承認北京] 會使美國不快嗎？！美國的政策在不使葡萄牙不快、不損害葡萄牙方面又做了些甚麼呢？！”⁴¹

38. Norberto Lopes, “現實主義的政策”, 里斯本日報, 第43年度, 第14763期 (1964年1月21日), 第1頁。

39. 同上。

40. “首頁: 中否?”, 共和國報, 第53年度, 第2系列, 第11683期 (1964年1月22日), 第1頁。

41. Pedro Correia Marques, “想法與事實: 中國巨人”, 心聲報, 第37年度, 第13164期 (1964年1月24日), 第1頁。

1964年1月24日，人民日報記者弗雷塔斯（José de Freitas）⁴² 發表了一篇內容尖銳、與政府一些溫和部門的看法接近的社論，呼籲承認北京。這位記者認為，葡萄牙從未將戰爭強加在中國頭上，他還提到葡萄牙在澳門的政策方針歷來是嚴格的中立。因此，他認為：“葡萄牙是在遠東有利益的國家——澳門是最漂亮的省份之一——，不會對國際生活中的現實置之不顧，有了這些現實才有其主權”。⁴³

1964年1月28日，葡萄牙報刊對國際大新聞機構發佈的有關戴高樂承認毛澤東政府的消息作出了反應。葡萄牙報刊上再次出現分歧，這種情況部份地反映出政府和民主反對派內部在葡萄牙承認北京問題上的敏感性。里斯本的心聲報將該消息納入其對美國的攻擊中，因為該消息有利於談判解決葡萄牙的殖民地問題。馬爾克斯以台灣政府在英國1950年1月6日單方面承認北京政府時沒有斷絕與英國的關係的事實為基礎，再次主張採納“兩個中國”的政策。這位撰稿人甚至錯誤地預言台灣在法國承認北京後不會斷絕與法國的關係。然而，他嘆息道：“……台灣為所謂的西方人服務的忠心，不應該被西方人當作一個已經被擠乾的檸檬一樣扔掉……”。⁴⁴

民族團結機關報晨報雖然沒有質疑法國與她喜歡的人建立關係的權利，但對此表示遺憾，並稱之為“荒謬的”行動，因為“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將推動“捨棄在福爾摩薩領土行使有效主權的台北政府”。該報紙假惺惺地反對巴黎的決定，因為這不是西方國家“集體態度”的結果，而是法國的單方面決定，“形成了〔與美國的〕分歧，而且是在如此敏感如此重要的領域”。此外，法國的承認勢必會在聯合國造成反響。法國的決定將推動非洲的一些法語國家組成一個有利於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大集團。這種情況可能

42. 這名記者特別瞭解中國、遠東及葡萄牙在該地區的存在。他出版了幾本書描寫這個地區，主要有：蔣介石，古老及現代中國，兩本書均是1941年發表；遠東戰役，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征服世界的秘密計劃：田中備忘錄，兩本書均發表於1944年；以及東方的葡萄牙土地，1953年。此外，曾於1952年陪同海外部部長羅德里格（Sarmiento Rodrigues）訪問葡萄牙在亞洲和太平洋群島的殖民地。

43. José de Freitas, “和平共處、中立及最可行之道”，人民日報，第22年度，第7644期（1964年1月24日），第6頁。

44. Pedro Correia Marques, “想法與事實：既成事實”，心聲報，第37年度，第13168期（1964年1月28日），第5頁。

會幫助北京政府取代台北政府在安理會的席位，這篇社論認為這將構成一個“嚴重的問題”。⁴⁵

這份晨報繼續攻擊法國承認中國，並以間接的方式抨擊葡萄牙的潛在意圖。在第二天發表的社論裡，這家報紙承認說，無論是北京和台北都拒絕“兩個中國的概念”，即“兩個中國”的原則，有分歧的是合法性標準問題。然而社論作者卻稱“兩個中國的存在是個不可抹殺的事實”，指出需要“保持”與北京及與台北的“正常關係”。⁴⁶換言之，這家報紙主張與兩個國家建立關係，然而，這種作法勢必會陷入僵局，因為兩個政府都斷然拒絕“兩個中國”的政策。

這份晨報以評論法國的決定為名，2月3日就此事又發表了一篇冗長的社論，呼籲在國際關係中“尊崇禮貌”。社論對戴高樂總統就承認北京政府及西方的兩個中國理論發表的講話的“精明”提出了批評，並質問法國元首的“激進”“思想”是否與“將秩序建基於對人權的拒絕及對一個我行我素政權的依賴之上的思想如出一轍？”雖然不能質疑法國與她喜歡的人建立外交關係的權利，但這家報紙認為戴高樂的政策已經走得“太遠，開始陷入困境”。社論最後對西方的“和解”政策“表示深切的遺憾”。⁴⁷換言之，葡萄牙極右翼的一些派別強烈反對承認北京政府，甚至荒謬地使用了美國為反對里斯本和北京建交而使用的相同理由。

相反，民主反對派的報刊仍然持相反的看法。共和國報這份一直對法國立場持贊同看法的晚報，在1964年2月4日的社論中認為法國對北京採取的新政策將“結束”“1949年以來盤踞在福爾摩薩島的蔣介石政府繼續代表中國的夢想，確切無疑的是，自1949年以來該政府就沒有在大陸中國進行管治”。⁴⁸

45. “國際摘錄：一項歷史性的決定”，晨報，第33年度，第11686期（1964年1月29日），第3頁。

46. “國際摘錄：中國和多個中國”，晨報，第33年度，第11687期（1964年1月30日），第7頁。

47. “國際摘錄：對禮貌的尊崇”，晨報，第33年度，第11691期（1964年2月3日），第1頁。

48. “戴高樂的法國所承認的毛澤東的中國”，共和國報，第53年度，第2系列，第11875期（1964年2月4日），第5頁。

然而，1964年2月13日，極端保守的晨報再次對巴黎和台北當月11日正式斷絕外交關係發表評論。該晨報的“國際摘要”欄目稱，“在北京和台北各有一個獨立的政府對特定和穩定的區域行使主權。事實上有兩個國家，所使用的論據對兩者均是適用有效的”。撰稿人最後說巴黎和華盛頓之間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承認，巴黎和台北斷絕關係不會造成“直接的重大後果”。⁴⁹

弗朗哥·諾戈拉將上述最後一篇社論視作“極右份子”反對立場的徵兆和揭示。他補充說，薩拉查“可能對極端份子的態度感到恐懼；關閉了曾經為我開放的綠燈”（1987, p. 89）。

總之，葡萄牙極端保守派的報刊，尤其是晨報，鼓吹“兩個中國”的政策。這種態度在兩個層面造成了反響。首先，無論是北京還是台北都斷然拒絕這項政策。其次，這份晨報警告說里斯本和華盛頓之間的複雜的分歧可能會加劇。然而，這種分歧自1961年4月莫尼斯（Botelho Moniz）發動流產的政變以來就已經存在（Venkataramani, 1991, pp. 1 – 23），在當年12月發生的果阿危機中英國和美國沒有給予支持，1963年肯尼迪總統的政府又施加政治壓力以尋求葡萄牙殖民地問題的政治解決。

澳門的葡文報刊並沒有傳播國際報刊散佈的傳言，也沒有對里斯本發表的任何社論作出反應。非官方報紙澳門消息報僅僅全文轉載了人民日報的弗雷塔斯（José de Freitas）1964年1月30日的社論。⁵⁰ 該文反映了當地葡萄牙政府暗地裡希望與中國大陸建立關係，以減少親北京澳門傑出華人在澳門的政治、經濟、貿易、金融和結社等領域，以及在澳葡政府內和通過澳門推動的非官方中葡關係中擁有的“過分”權力。

撤消行動

弗朗哥·諾戈拉1964年2月14日再次會見安德森大使，但已經是落敗的政治家。討論了塞浦路斯和非洲問題後，安德森將一份電傳給弗朗哥·諾

49. “國際摘要：北京與台北”，晨報，第33年度，第11700期（1964年2月13日），第1頁。

50. José de Freitas, “和平共處、中立及最可行之道”，澳門消息報，第17年度，第4860期（1964年1月30日），第4 – 5頁。

戈拉看。電傳說正在澳門舉行承認北京的談判，稱惟一的障礙是葡萄牙“試圖保留其與福爾摩薩的關係”。⁵¹ 弗朗哥·諾戈拉拒絕了大使的說法，反駁說，“……台北：在安理會裡不僅口頭攻擊我們而且還投票反對我們：難道北京代表做的還能超過這些？”安德森回答說，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在里斯本開北京大使館及在盧安達和洛倫索馬貴斯開領事館的問題。弗朗哥·諾戈拉承認這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但認為葡萄牙不會被“嚇倒”，因為“有的西方國家的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活動是非常危險的”。安德森要求就此作出解釋，而弗朗哥·諾戈拉則回答說：“我們的做法和我們的朋友和盟國在我們中所做的是一樣的”。⁵² 為了避免造成兩人之間的猜忌，弗朗哥·諾戈拉補充說等兩人都結束公職時可以再討論這個問題。

1964年2月15日，弗朗哥·諾戈拉與薩拉查在政府首腦官邸一起工作。⁵³ 對其繼承人規劃的行動，薩拉查開始出現了猶豫的跡象。外交部長將薩拉查的“保留態度”歸咎於極右派“基於意識形態原因”（Nogueira, 1984, p. 553）對薩拉查施加的強大壓力。

計劃中的行動面臨挫折，面對這種情況，加爾定在弗朗哥·諾戈拉知情的情況下直接與薩拉查聯繫並獲得接見。加爾定這樣寫道：

“……（我在里斯本待了兩個星期）但外交部長卻沒有從薩拉查博士那裡獲得決定，儘管他兩次與之一起工作。對我來說，這確實不是個好兆頭。弗拉古蘇〔內塞西達宮的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是弗朗哥·諾戈拉得力助手〕亦是相同的想法，他很沮喪。得到弗朗哥·諾戈拉的同意後，我決定給部長會議主席打電話，他馬上就定下了與我見面的時間”（Jardim, 1976, pp.55—66）。

與此同時，美國外交機器對葡萄牙施加了神秘的政治壓力。1964年2月20日，國防部秘書長的副秘書安達拉德（Luís Noronha Andrade）海軍少將，

51. 國立檔案學院 / 東坡塔，“關於弗朗哥·諾戈拉部長與美國大使安德森1964年2月14日談話的外交部記錄”，AOS/CO/NE-30B, Pt.38, fl. 219, IAN/TT, 里斯本。

52. 同上。

53. “回音：部長會議主席官邸”，消息日報，第100年度，第35186期（1964年2月16日），第2頁；“今日簡報：部長會議主席官邸”，晨報，第33年度，第11703期（1964年2月16日），第2頁。

給外交部秘書長阿爾切發了一封公文，告知在獲得60m/m迫擊炮上因美國國務院設置的障礙而遇到困難，要求想辦法打破封鎖。⁵⁴ 儘管這方面有些吃緊，但葡萄牙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明顯降低。六十年代，“傳統的盟國發生了真正的顛倒，儘管沒有在任何政治條約中正式化也沒有被廣大公眾瞭解。簡單來說，非洲戰爭所必需的政治、技術和軍事支持不再由英國和美國提供，而是改由法國和德國提供”（Telo, 2000, p. 132）。

這種局面為薩拉查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政治口實去徹底取消弗朗哥·諾戈拉規劃的行動。2月22日在聖奔托的官邸接見加爾定時⁵⁵，政府首腦最終取消了弗朗哥·諾戈拉的接近中國大陸的行動。加爾定就此寫道：

“……處理完其他事務（主要是馬拉維問題）後，我直接提出了促使我來到里斯本的那個問題。他支吾搪塞著，沒有像往常那樣作出明確的說明，我們就談到我回莫桑比克，盡快將作出的決定告訴我。他建議我有時間的話繼續研究我所喜歡的中國問題。他心情非常好地向我保證我將是派駐北京的首任大使，如果有朝一日建交的話。弗朗哥·諾戈拉和弗拉古蘇憂傷不已。是甚麼原因使薩拉查一改原來的習慣而取消了已經作出的決定，我們就此想了很多很多。我們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圓滿的解釋。我永遠也不會弄明白的是他們到底使用了甚麼理由和手段”（Jardim, 1976, p. 66）。

然而，“美國的壓力”並不能圓滿地解釋薩拉查的最終決定。一切跡象都使我們相信，如同中葡關係1949 / 50年時期那樣，“薩拉查意識形態上的堅定不移的不妥協”對於弗朗哥·諾戈拉1964年未能推進其行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Fernandes, 1999, p. 990）。而弗朗哥·諾戈拉在此事上表現出的政治行為與他在1963年9 / 11月向薩拉查表示試圖簽訂1963年葡萄牙和美國關於葡萄牙海外領地的協議時（Amaral, 1994, pp. 57 – 58）的表現非常相似，當時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致力於為葡萄牙殖民地問題尋求一個和平政治解決方案。

54. 外交部，“國防部副秘書安達拉德海軍少將1964年2月20日致外交部秘書長阿爾切關於‘物資的供求和購買——在美國購買60m/m迫擊炮’的1117 / C, Proc. 3203 / 64號秘密公文”，封面標題為“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葡萄牙承認共產黨中國，1964年”，2. ° P., PEA M. 263, AHDMNE, 里斯本。

55. 國立檔案學院 / 東坡塔，“薩拉查關於1964年的日記”，AOS / DI-8, vol. 4, p. 92, IAN/ TT, 里斯本。

弗朗哥·諾戈拉於1964年3月17日將此事暫時擱置。同日，他以樂觀的口吻指示政治談判司司長弗拉古蘇大使將周恩來致薩拉查的照會“存檔”。⁵⁶

然而，接近北京的問題仍然在內塞西達宮存在。隨員馬查多（Sá Machado）在一份“機密情報”中認為，葡萄牙應該與法國及其他西方強國共同提出讓北京政府加入聯合國並驅逐台北國民黨政府的提案。⁵⁷ 然而該看法並沒有得到葡萄牙極右翼一些派別的認同。他們知道此前是法國提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里斯本政府的官方晨報猛烈抨擊法國的立場，該報紙為其立場辯解說：“根據同一〔現實主義〕原則，不可能拒絕台北政府對福爾摩薩區域行使的主權，沒有甚麼理由要將這個不重要的區域置於國際衛生組織的工作範疇之外”。⁵⁸

葡萄牙政府的態度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兩個重要大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做法。這兩個國家的政府採取了非常現實的做法，自五十年代末以來將大量的小麥和大麥賣給了中國大陸（Kyba, 1991, pp. 168–186; MacFarquhar, 1997, pp. 23–30; Fernandes, 2000b, pp. 208）。

北京重申保持澳門現狀

北京對秘密試探作出了非常審慎的反應。她繼續推行其“人民外交”的政策，即推動雙方的非官方接觸，並向澳門的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中央政府發出了要保持飛地現狀的謹慎信號。在首要政治領域，里斯本人民日報的弗雷塔斯於1964年3月27日至4月27日訪問了澳門和中國。⁵⁹ 人民日報的這名“特使”的啟程日期是為了能夠在里斯本和北京外交關係正常化時進行訪問而確定的。⁶⁰ 雖然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失敗了，但北京還是同意弗

56. “致弗拉古斯博士：應將此信函存檔，以便於查找，如果不久需要它的話，1964年3月17日，弗朗哥·諾戈拉”，載“弗朗哥·諾戈拉部長對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弗拉古斯大使的批示”，封面標題為“與人民中國的政治關係，1964年”，PEA-Confidenciais M. 20 AHDMNE，里斯本。

57. 外交部，“聯合國科的隨員馬查多1964年5月8日提交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第19屆聯合國大會上‘被接納’可能性的機密情報，第19頁”，PEA M.263, AHDMNE，里斯本。

58. “國際摘要：現實主義”，晨報，第33年度，第11721期（1964年3月5日），第1頁。

59. 對中國的訪問於1964年4月6日至22日進行。行程的其他日子是在澳門度過的，在那裡會見了葡萄牙政府和親中國大陸的傳統傑出華人的主要領導人。

60. 在根據其對中國大陸的訪問撰寫的發表於1964年7月的中國戰勝過去這本書的第一章中，弗雷塔斯這樣寫道：“我是作為獨立記者訪問中國的，沒有任何約定，也沒有邀請，全部

雷塔斯訪問中國大陸。⁶¹ 然而，採訪工作量遠遠超出原先的預計。弗雷塔斯未能獲准採訪中國領導人。澳門總督羅必信就此寫道：

“……今天我接見了訪問中國大陸歸來的人民日報記者弗雷塔斯。他說他受到了非常有禮貌和正確的接待。他強調說未能像期望的那樣採訪周恩來和毛澤東，也未能向北京電台發表講話。[……]他說在他的印像裡，中國大陸正在等待葡萄牙方面的任何態度”。⁶²

面對挫折，中國中央當局仍然繼續發出他們要與里斯本和澳門保持非官方接觸的謹慎信號。應廣交會執行委員會的邀請，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動身前往廣東省首府。該啟程的“惟一目的是以私人身份參觀廣交會，瞭解我們在該城市的已經關閉的領事館的情況”。⁶³ 然而，澳門消息報1964年5月15日稱，康德可能會訪問“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⁶⁴ 實際上總領事的訪問僅僅局限在廣交會，因為北京後來在葡萄牙外交官的訪問事宜上改變了主意。表面上，這可能是何賢和澳門親北京的傑出華人設置的一個障礙，他們並沒有甚麼興趣建立雙邊外交關係，因為這可能減少其在澳門、廣州和北京的影響力。康德與何賢、崔樂其、蔡良遂及David Barrote 共進了午餐，他就此寫道：

“我聽的比說的多，我相信，以任何像何賢先生對待我提出的會見領事館一等秘書[Eugénio Miguel]的要求的方式去行事，不會有任何的進展”。⁶⁵

花我的報社的錢。我因此感到擁有充分的權利——一個獨立的聲音，而不是葡萄牙的聲音，一個瞭解和熱愛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聲音，他絕不會忘記澳門和那裡的人們——從國家利益角度去評估放棄一項已證明失敗的孤立中國的政策” (Freitas, 1964, p. 36)。政府新聞檢查機構允許出版這本主張放棄對北京進行國際孤立的政策並贊揚毛澤東政府的許多方面的書，這個事實說明葡萄牙領導層的一些有影響力的圈子有意醞釀承認北京並在里斯本和北京間建立起外交關係。

61. 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弗雷塔斯是由蔡良遂陪同往返於澳門和廣州之間，其餘的時間是由崔樂其陪同的。這兩人都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澳葡政府立法會成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委員”何賢的秘書兼翻譯。
62. 國立檔案學院 / 東坡塔，“澳門總督羅必信和海外部長科雷亞 (António Augusto Peixoto Correia) 指揮官1964年4月23日的電報”，AOS / CO/UL8I, Pt. 8, l. ^a Sbd., fl. 1310, IAN/TT, 里斯本。
63. 外交部，“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 (Eduardo Condé) 1964年5月30日第8 - A / 64號公文”，PEA M. 263, AHDMNE, 里斯本。
64. “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澳門消息報，第17年度，第4947期 (1964年5月15日)，第6頁。
65. 外交部，“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1964年 (5月15日至19日) 參觀廣州春季交易會的機密報告，1964年6月10日，第4頁”，PAA M. 801, AHDMNE, 里斯本。

雖然缺乏理解，北京政府仍然表現出有意保持與葡萄牙的秘密接觸。1964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巴黎大使向戴高樂總統遞交了國書。遞交國書儀式結束後，黃鎮大使向葡萄牙駐巴黎大使馬迪亞斯發了一份照會，告知他已經向法國國家元首遞交了國書，照會上寫道：“*Je saisis cette occasion por vous assurer que je m’efforcerai d’établir de bons rapports avec Votre Excellence*”。⁶⁶ 面對這種進展，弗朗哥·諾戈拉指示作出一個“使用與中國照會相同措辭的答覆”。⁶⁷

在推行“人民外交”政策及向澳葡政府表示良好意願的過程中，一群澳門土生和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應邀對中國大陸做了一次“學習旅行”。⁶⁸ 這個六人旅行團包括澳門利宵中學的兩名教師（Castro Monteirrom 和Boavida da Rocha）、一名工程師（Telo da Gama）、兩名建築師（José Maneiras, Manuel Vicente 及其妻子Natália Vicente），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彭彼得陪同訪問。該參觀團的第三次“私人性質的訪問”發生在1964年6月13日至24日。⁶⁹

此外，為了公開（儘管是以非常審慎的方式）表示保持澳門的現狀，北京繼續對澳門推動其“文化和體育交流”。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組織下，擁有世界男女乒乓球冠軍頭銜的中國大陸國家乒乓球隊於1964年6月17日至21日訪問了澳門。在澳門期間的6月18-19日，他們與當地的球隊舉行了兩場表演賽，成千上萬的澳門居民前往觀看。⁷⁰ 澳門總督羅必信亦觀看了最後一場的表演。當他向中國國家隊的運動員致意和表示祝賀時，國家隊領隊陳善（譯名）⁷¹ 和中國體育部的一名助理向總督表示：“這次訪問是中國大陸對澳門的友好表示”。⁷²

66. 外交部，“葡萄牙駐巴黎大使馬迪亞斯（Marcello Mathias）1964年6月8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704號公文”，PEA M.263, AHDMNE, 里斯本。

67. 外交部，“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就“阿梅達（Fortunato de Almeida）1964年6月16日的記錄’簽發的批示”，PEA M.263, AHDMNE, 里斯本。

68. “通過城市：走向北京”，號角報，第17年度，第13期（1964年6月14日），第2頁。

69. “澳門星期記事：1964年6月14日至20日”，澳門消息報（插圖週刊），第17年度，第533期（1964年6月21日），第6頁；“澳門星期記事：1964年6月28日至7月4日”，澳門消息報（插圖週刊），第17年度，第535期（1964年7月5日），第6頁。

70. “乒乓球：世界冠軍今日做表演”，澳門消息報，第17年度，第4974期（1964年6月18日），第3、6頁；“返回中國大陸”，澳門消息報，第17年度，第4977期（1964年6月22日），第6頁。

71. 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

72. 外交部，“總督羅必信1964年6月22日致海外部部長科雷亞（António Augusto Peixoto Correia）指揮官的電報”，PEA M.263, AHDMNE, 里斯本。

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

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從中方的觀點來看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呢？可能不具有可行性。七項基本理由使里斯本和北京就兩國建立外交關係達成諒解的任何可能性成為不可能。

首先，如同我們前面所作的分析那樣，弗朗哥·諾戈拉的建議實質上相當於“兩個中國”的理論。而該政策遭到北京和台北的斷然拒絕。毛澤東的政府歷來要求那些有意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的外國政府正式斷絕與台灣的外交和領事關係，作為不可或缺的條件（Fernandes, 2000 b, pp. 311 – 312及319）。

其次，中國大陸當時正在搞“大躍進”，並因此在中國黨和國家機器內部產生了嚴重的政治不穩定，主要是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對立。這種情況使毛澤東政府面對西方的國際自我孤立主義日益加劇，使兩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變得更加困難。

第三，當時中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惟一創新是北京提出組織西方國家廣泛陣線的建議，即建立“第二中間地帶”以抗衡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霸權主義。然而這項政策對西方強國並沒有多少吸引力和號召力。當時惟一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政府是戴高樂的政府。然而法國的行為深刻地受制於其國家元首和其政治精英的“雅爾塔綜合體”。

第四，由於五十年代末中蘇開始出現分歧，為了與蘇聯的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的方針劃清界限，北京政府在政治和宣傳領域的意識形態變得更加僵硬和正統。這是這種僵硬的意識形態構成了北京和里斯本達成任何諒解的障礙。

第五，中國在非洲推行一項獨立的新政策，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競爭。推行這項有關非洲及葡語非洲解放運動的方針，制約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安哥拉和幾內亞 – 比紹分別於1961年2月4日和1963年1月23日開始武裝鬥爭後。如果要在葡語非洲與蘇聯競爭，中國沒有別的選擇，祇能增加向葡語非洲解放運動提供政治、外交和軍事援助。換言之，北京政府從來無意為了里斯本和北京間建立關係而犧牲她在1961年至1963年期間從解放運動及亞非集團那裡經過艱苦奮鬥而取得的政治資本。葡語非洲解放運動和亞非集團紓緩其對葡萄牙的攻擊，是違背中國大陸利益的，而且毛澤東政府勢必要因此失去其對解放運動和亞非集團的影響力和威信。

第六，1961年4月15日，葡萄牙與毛澤東政府敵視的南韓建立外交關係，以及在1962年的第17屆聯合國大會上葡萄牙支持南韓的立場，使里斯本和北京之間達成諒解的可能性變得更加渺茫。⁷³

第七，里斯本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將使毛澤東的政府更容易受到蘇聯和親莫斯科的共產黨的政治宣傳攻擊。絕不可能是中國在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取得的“勝利”。

此外，當國際傳媒廣泛傳播里斯本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傳言時，這種局面就更加公開化了。國際傳媒散佈里斯本和北京建交傳言的幾個月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真理報就此事向毛澤東政府發起了猛烈的政治宣傳攻勢。⁷⁴在一篇發表於1964年7月8日的題為“北京令人驚訝地成為薩拉查的容忍者”的文章中，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指責中國對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提供間接幫助。這份日報寫道：“北京的中國領導人嘴裡說了很多堅定忠實支持亞非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的話語。然而他們的超革命言辭經常對立於他們的行動。”⁷⁵

針對國際報刊對葡萄牙與北京建交的可能性所作的猜測，真理報這樣評論道：“北京沒有闢謠。重要的是這些猜測恰恰出現在許多非洲國家斷絕與葡萄牙的關係以抗議葡萄牙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其他非洲殖民地實行的殖民政策之時”。⁷⁶這份日報稱，由於中國的合作政策，葡萄牙政府為葡萄牙政府和中國大陸之間的聯繫人何賢頒發了榮譽勳章。真理報繼續寫道：

“葡萄牙總統阿梅利科·托馬斯公開宣稱里斯本需要承認北京。由於加強了要求歸還其在果阿、帝烏和達曼前殖民地的宣傳運動，葡萄牙帝國主義非常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支持印度解放其領土的正義鬥爭的事實”。⁷⁷

雖然中國大陸的宣傳機構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對來自莫斯科的指責作出反應，但澳門的葡文報刊很快就對真理報刊載的文章給予猛烈的回擊。

73. 外交部，“與朝鮮的政治關係”，PEA M.183, AHDMNE, 里斯本。

74. 六十年代初以來，中國接近葡萄牙的政策受到蘇聯及親蘇聯的西方國家共產黨的公開嚴厲的譴責。赫魯曉夫1962年12月12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演講之後，對中國的抨擊進一步昇級，變得更加激烈。蘇聯領導人在他的演講中強調其中國同行的理論和實踐是矛盾的。

75. “真理報指責中國向葡萄牙政策提供間接幫助”，電報報 [厄瓜多爾，瓜亞基爾]，（1964年7月9日），第4頁。

76. 同上。

77. “紅色中國幫助葡萄牙——真理報”，雅典新聞報 [希臘，雅典]，（1964年7月9日），第2頁。

葡萄牙政府的半官方報紙澳門消息報對蘇聯的指責作了回應，指出飛地20%的預算，即全部二千五百萬澳門幣中的五百萬元，是用於公共醫療工程。該報紙還提到設在氹仔的社會康復中心在對抗藥物依賴的鬥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聯合國官員先後多次訪問澳門以評估反對服用麻醉品的鬥爭和難民收容的工作和計劃。⁷⁸

天主教雙週刊號角報於1964年7月12日發表了一篇內容深刻的長篇文章。這家報紙認為，所散佈的消息不過是旨在玷污澳門“生活”和“使命”的無恥“造謠”和“誹謗”。報紙還提到了葡人社群與華人社群之間的“共處”氛圍，並援引了原海外部長莫雷拉(Adriano Moreira)的話，當時他說“葡萄牙人民是惟一到中國但沒有對中國發動戰爭的人民”話是毛澤東說的。如同澳門消息報一樣，這家報紙提醒說，澳門葡萄牙政府將20%的預算用在“醫療和慈善性質的工程上”。⁷⁹

對蘇聯的政治宣傳挑釁感到憤怒的新華通訊社於1964年7月28日就中葡關係問題發了一份通訊稿。這篇稿子的要點是對真理報發表的評論文章進行揭露。談及俄國的第一項指責，新華社說真理報的指責純粹是西方報刊誹謗的翻版。有關與葡萄牙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新華社僅僅作了簡短的回應：“中國從未考慮過”⁸⁰這樣的可能性。為了公開維護中國大陸在亞非集團內的革命頭銜，新聞稿三分之二的篇幅用於稱頌非洲葡屬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及用於揭露蘇聯與西方帝國主義合謀。⁸¹

結論

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源自多種因素，有個人的也有高層政治方面的因素。1961年12月果阿的陷落，使葡萄牙外長更認為葡萄牙有必要承認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然而，薩拉查在檢討葡萄牙殖民政策時所表現出的不妥協態度，無論是1962年弗朗哥·諾戈拉的建議還是面對非洲統一組織、肯尼迪政府和聯

78. “誹謗政策”，澳門消息報，第17年度，第4992期（1964年7月11日），第1頁。

79. “俄國繼續推行其造謠政策：澳門和澳門人民抗議無恥的誹謗和中傷者”，號角報，第17年度，第21期（1964年7月12日），第1、7、8頁。

80. “……中國從未考慮過……”，載“新華社駁斥真理報的誹謗”，北京週報，第8卷，第31期（1964年7月31日），第4頁。

81. 同上。

合國1963年以相同的名稱分別提出的建議都是如此，對弗朗哥·諾戈拉構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然而，周恩來1963年8月2日致薩拉查的正式照會，何賢1964年1月的建議，巴黎和北京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及任命加爾定擔負這項使命，這一切使上述複雜的局面得到局部扭轉。這種局面或許促使薩拉查對弗朗哥·諾戈拉規劃的行動表示同意，儘管他當時是“有保留的”。

任用加爾定，而他卻未能說服薩拉查最終批准實施行動，這表明弗朗哥·諾戈拉在說服政府首腦接受其建議方面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當時的葡萄牙報刊反映了政府內部對此事的主流政治敏感性。極右報刊施加的壓力最終體現了美國大使館以及其他的保守政府派駐里斯本的使團施加的秘密政治壓力。此外，極右新聞機構提出的一些理據被巧妙的使用，作為取消規劃中的行動的口實。

向派駐重要外國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葡萄牙外交官封鎖信息，顯示出這是適得其反的作法。首先這種作法表明葡萄牙外交部領導層對其派駐國外的最高級別的外交代表缺乏政治信任。與此同時，它給葡萄牙代表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尷尬，使他們不得不自行其是，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以便在被外國外交官問及此事時能夠作出合乎情理的回答。

雖然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表明政府的重要成員適應國際新局勢的能力，但它亦揭示出內部性質的原因是如何嚴重制約了弗朗哥·諾戈拉規劃的行動，而這項行動的惟一基石是“兩個中國”政策而不是“一個中國”政策。此外，巴黎和北京相互承認和建立外交關係後不久，法國領導人不得不放棄了西方的“兩個中國”理論。然而，當弗朗哥·諾戈拉將其行動置於引導西方國家政府行為的理論中時，他規劃的行動卻顯示出政治目的的局限性。

有關葡萄牙承認中國及中國保持澳門現狀政策的傳言，演變成北京政府面對的嚴重政治宣傳問題。莫斯科開動宣傳機器，展開猛烈的政治宣傳攻勢攻擊中國大陸。嚴厲的指責迫使毛澤東政府對葡萄牙的承認問題表了態。然而，作出的回答表明，中國大陸不會以其在非洲和亞非集團投入的政治資本為代價去換取葡萄牙的承認。換言之，弗朗哥·諾戈拉爭取葡萄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承認和建立外交關係的企圖是北京所不能接受的。無獨有偶，在意識形態上，薩拉查對中國在葡語非洲尤其是亞非集團採取的官方政策持不妥協態度。

參考書目

Amaral, Diogo Freitas do (1994), 《關於葡萄牙海外領土的未來的協議書的失敗嘗試》, 1963年, 科英布拉, 科英布拉出版社。

Antunes, José Freira (1996), 《加爾定: 秘密特務, 1912-1982》, Venda Nova, Bertrand 出版社。

Cabral, Morais (1964?), 《今日自由中國》, 台北, 中國出版公司。

Cruz, Manuel Braga da (1988), 《薩拉查主義下的政黨與政府》, 里斯本, Presença 出版社。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1998), 《1949-1966年葡中關係概況》, 《行政》雜誌第十一卷第四十期(1998年6月), 第299-331頁。

——(1999), 《中葡關係中的澳門: 1949-1979》, 《行政》雜誌第十二卷第四十六期(1999年12月), 第989-1002頁。

——(2000a), 《葡萄牙、澳門與中國-利益的匯合處》, 歷史, 22年度(新系列)第21期, (2000年1月), 第56-57頁。

——(2000b), 《葡中關係中的澳門概要, 1945-1995年: 年表及文件》, 里斯本, 東方基金會出版。

——(2001), 《1949至1999年間中葡關係的演變》, 載於《葡萄牙政府改革——問題與展望》, 里斯本, Bizâncio 出版社。

Freitas, José de (1964), 《中國戰勝過去》, 里斯本, Cosmos 出版社。

Hermann, Margaret G. (1978),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刊載於《*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Maurice A. East et al., eds., 倫敦, Sage 出版社。

Hinton, Harold C. (1970), 《*China's Turbulent Quest*》, 倫敦, Collier-Macmillan。

Hutchinson, Alan (1975),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出版社。

Jardim Jorge (1976), 《莫桑比克: 被燬的土地》, 里斯本, Intervenção。

Kyba, Patrick (1991), 《*Alvin Hamilton and Sino-Canadian Relations*》, 刊載於《*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Paul M. Evans 及 B. Michael Frolic 出版社, 多倫多, 多倫多大學出版社。

Léonard, Yves (1999), 《葡萄牙海外領土》, 載於《葡萄牙拓展史: 末代帝國與再集權, 1930-1998》, 第五卷, Francisco Bethencourt e Kirti Chaudhuri, coords., 里斯本, 讀者圈, 第31-50頁。

MacFarquhar, Roderick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牛津, 牛津大學出版社。

Neves, Fernando d'Oliveira (1999), 《弗朗哥·諾戈拉與我的父親》, 載於《弗朗哥·諾戈拉大使, 1918-1993——引起回想的文章》, Teresa de Melo Ribeira et al., 波爾多, 文化書局出版社。

弗朗哥·諾戈拉 (1952), 《東方政治》, 里斯本, 外交部。

—— (1984), 《薩拉查——抵抗, 1958-1964》, 第五卷, 波爾多, 文化書局出版社。

—— (1987), 《一個政治家的告解: 日記, 1960-1968》, 第三版, 波爾多, 文化書局出版社。

Pinto, António Costa (1999), 《葡萄牙與抵抗非殖民化》, 載於《葡萄牙拓展史: 末代帝國與再集權, 1930-1998》, 第五卷, Francisco Bethencourt e Kirti Chaudhuri, coords., 里斯本, 讀者圈, 第51-64頁。

葡萄牙外交部 (1964a), 《1964年1月1日葡萄牙大使及領事年刊》, 里斯本, 外交部。

葡萄牙外交部 (1964b), 《1964年2月4日外交部長宣布的記者招待會》, 里斯本, 外交部資訊部門。

葡萄牙外交部 (1973), 《有關外交關係的維也納協議》, 里斯本, 外交部秘書長處。

Roy, Denny (1998),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倫敦, Macmillan。

羅必信 (1994), 《羅必信將軍: 澳門總督, 1962-1966》, 《帝國的諸位末代總督》, Paradela de Abreu, coord., 里斯本, Neptuno出版社, 第353-363頁。

Smith, Michael (1989), 《*Comparing Foreign Policy Systems: Problems,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 載於《*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y: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s Approach*》, Michael Clarke及Brian White, eds., 倫敦, Edward Elgar。

Telo, António José e Hipólito de la Torre Gómez (2000), 《當代國際體制中的葡萄牙與西班牙》, 里斯本, Cosmos出版社。

Tengarrinha, José (1999), 《新聞界》, 載於《葡萄牙歷史詞典》第八卷, António Barreto及Maria Filomena Mónica, coord., 里斯本, Figueirinhas 書局, 第245 – 247頁。

Venkataramani, M. S. (1991), 《*Overthrowing a NATO Prime Minister: A Study of Washington's Role*》, *International Studies*(Nova Deli), 第二十八卷第一期 (1999年1 – 3月), 第1 – 23頁。

Whiting, Allen S. (1975),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MI, Michigan大學出版社。

Yahuda, Michael (1983), 《*Towards the End of Isolationism: China's Foreign Policy After Mao*》, 倫敦, Macmillan。